

魏源思想的理学渊源

——以湖湘实学为视角

○ 秦世龙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魏源继承和发展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湖湘理学的实学传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以经术为治术”的实学理念,在求学考试和入幕参佐的生涯中,他秉持这一实学精神,投身到晚清的学术、政治、经济变革大潮中去,并且多有创拓,引领一时风气。魏源作为一个在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他的各种思想的渊源其实都可以追寻到他的湖湘学者的身份上,追寻到他饱受熏陶的湖湘理学上来。

[关键词]魏源思想;理学;湖湘学;经世致用;实学传统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历来对魏源思想的研究,大都免不了几个标签性的表述:“今文学之健者”、“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经世致用学风的揭橥者、近代佛学先驱等。考察魏源一生的学术、政治活动,鉴于其交游经历之丰富以及思想变迁跨度之大,他可以被定义的标签显然不止于此,比如还有理学家、汉学学者等等。而且向来谈论魏源的思想变迁,大都认为他初尚理学,后改投常州学派研究今文经学,之后却又对理学大加批判,但是深入研究魏源的思想变化并根据其实际状况进行考察,却能发现,魏源一生的思想转变始终没有根本性地走出理学的大范畴,他的各种思想变迁,也是基于他的理学根基而来的。

一、湘学的实学本质及其对魏源的影响

魏源出身于湖南邵阳一个家道中落的宗族家庭里,在宗族亲属的帮助下,魏源得以在族塾中完成启蒙学业。据史料载,魏源“八岁受书,即解大义”^[1],在八

作者简介:秦世龙(198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经学史。

岁时即接受“大义”之教育,即当时的理学义理之说教,可见族亲对他的期望便是成为信奉程朱理学的科举士子,而魏源启蒙阶段的教育便由此打上了理学烙印。魏源“十五岁,补县学弟子员,始究心阳明之学”^[2]。魏源在县学不仅接受官方的传统程朱理学教育,而且还深入研究了阳明心学,可见其学问的根基就是湖南的传统理学。魏源在邵阳县学及稍后的湖南岳麓书院读书期间,由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被当时的历任湖南学政如李宗瀚、徐松、汤金钊,以及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所赏识。这几位都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他们对魏源的各种提携和帮助,深刻地影响了魏源的学术道路。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魏源所就读的岳麓书院,对于湖湘学的渊源及学统都起着核心作用。

南宋时由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创建的湖湘学派,最初被朱熹学派称为“湖湘学”或“湖南学”^[3],该学派一般被认为是最早完全成型的湘学形态。胡安国作为洛学的私淑者,与二程的弟子杨时、谢良佐、游酢“义兼师友”^[4],对于南宋初年二程学术的南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胡安国开创的湖湘学派也深受二程理学的影响。胡宏是胡安国的季子,他引入了“性”的概念,对二程的“理”做出了哲学上的补充,认为“性”是宇宙的本体,“理”只存在于“性”之中;“心”也只是“性”的外在表现,即“性体心用”,这就奠定了湖湘“性心之学”的基础。《宋元学案》全祖望案语称:“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5]全祖望引用吕祖谦(东莱)对胡宏(五峰)《知言》的评价,不仅肯定了胡宏(五峰)的学术成就及其湖湘学派的奠定者地位,而且也间接肯定了湖湘学派开创湘学传统的地位。张栻,号南轩,南宋汉州绵竹人,师事胡宏,深得二程、胡宏学术思想之精要,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长期在岳麓书院担任主讲,大力宣讲理学,推广其思想与主张。乾道三年(1167)八月,当时的“东南三贤”之一、“闽学”派的开创者朱熹从福建武夷山赶到岳麓书院,前来同张栻论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这种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开辟了岳麓书院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务实道路,也使得胡宏、张栻开创的湖湘学派自一开始便与朱子之学互相包容、取长补短,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朱(熹)张(栻)之学。其后的历代书院山长也都以推广朱(熹)张(栻)之学、弘扬湖湘文化为己任,使得湖湘学派的不重门户、务实求同传统一直得以延续下来。湖湘学派的学术风气主要有以下几个传统:第一,推崇理学;第二,强调经世致用;第三,主张躬行实践。^[6]这些传统累积在一起,体现了湖湘学术的实学性质,故湖湘传统又可被称为实学传统。

葛荣晋教授认为:“中国所谓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者那里,其实学思想或偏重于‘实体’,或偏重于‘达用’,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偏重于二者之中的某些内容,情况虽有区别,但大体上不会越出这个范围。‘实体达用之学’既是实学的基本内涵,又是实学的研究对象。”^[7]具体到湖湘学派,南宋时期的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显然已经开始构筑起于“达用”而追溯

“实体”的实学体系。胡安国有感于北宋亡于金兵南侵,致力于寻求学问上的救国之道,他破除三家家法,以义理说经,著成《春秋传》,将理学的大义与《春秋》的微言结合起来,申明天地纲常,用以叫醒世人,以图进取,达到教化的目的,这就表达了湖湘学术着眼于“达用”的初衷。而随着胡宏对二程的“理”进行“性”的补充,认为“理”存在于“性”之中,这就达到了“实体”之学的层次。而后张栻对胡安国、胡宏的理学修养工夫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察识端倪”的学说,即通过已发之心来体会未发之性,用实践来检验和提高修养工夫;又在胡宏的“性”本论基础上提出“仁”的概念,将“天理”与“人道”通过“仁”连接起来,使湖湘学派的性本论更多地体现出人文关怀的色彩;这都体现出张栻更加务实的学术态度与学术主张。因而可以说,湖湘学从一开始建立就很明确地指向实学的方向。

朱汉民教授在《论湖湘实学传统的近代转型》一文中通过对王夫之、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实学观点的阐述,考察了明清以来湖湘实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通过考察近代以来湖湘实学在面对国家危急局面时所采取的态度和主张,反思湖湘实学在近代的转型,并进而挖掘这一背景下的湖湘文化内涵。作者认为,湖湘实学在近代的转型,即将西学纳入湖湘学术的体系之内加以吸收和利用,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就在于湖湘传统学术的实学思路。文中对魏源的论述是:“(魏源)彻底否定了‘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的局面,将学术界已分裂为三的道、学、治重新统一起来,从而继承和弘扬了湘学的重实体达用的实学传统。”^[8]

反思上述文章,考虑魏源何以能继承和弘扬“实体达用”之传统,我们可以得出两点:首先魏源在湖湘学术的氛围中接受了基础教育,其学术根基就是以理学为风尚的湖湘学;其次,魏源对王夫之学说多有承继,可以说魏源是继王夫之后湖湘学派的另一位思想家。前者可以通过魏源进入岳麓书院学习的经历得以验证,这意味着魏源接受到了正宗的湘学教育,也标志着他真正打下了坚实的湘学基础。而后者,魏源对王夫之学说的继承是有章可循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魏源的好友邓显鹤、邹汉勋整理的《船山遗书》得以刊刻问世,从此,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才受到世人重视。而作为邓显鹤的挚友,魏源不仅很早得知邓有意于整理刊刻船山著作的志愿,而且还在邓搜访湘籍名贤著作的过程中予以帮助,所以魏源是较早接触到船山思想并在船山思想影响下从事学术活动的,他与王夫之思想的一致性也反证了这一点。王夫之推崇胡宏的性理之学,他曾说“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异情。’黠哉,能合颜、孟之学而一原者,其斯言也”^[9],这就肯定了胡宏理欲统一的观点,否定了朱熹所持性理二元论的观点,从而在人性论的高度论证了实学研究的正确性;由此展开来便是主张理归于气、道归于器,使妙不可言的“理”与“道”回归到现实世界,明显体现出的是“明体达用”的实学精神。魏源正是领会到船山思想的这一精髓并时时加以贯彻,才能在其日后的学术活动和仕途之中,往往能够不为迷相所惑,求实进取,走出一条偏执于经世致用的人生道路。

魏源无论从小进入族塾读书,还是“究心阳明之学”,还是进入县学、岳麓书院研究湘学,他所接受的一系列的基础教育都属于理学,加之其学业精良,更造成魏源学术生涯的启航点和主要精力都在理学研究上。魏源的《学校应增祀先圣周公议》和《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孟子年表考》等作品均作于此时,^[10]这说明他的学术根基已经相当深厚,但也能反映出他此时的学术旨趣大体并没有超出当时的官方理学范畴。

二、从经世致用走向济时救世

魏源不仅继承,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实学传统,为近代的湖南学术转型增添了新的内涵。他继承和发展实学传统的一个表现便是将经世致用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济时救世的理想,这一理想表现在实践中便是广交天下师友、谋求救世良方。为此,他一方面拜访名师益友,交流学问以及修身之道,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他并不局限于当时的学校授课以及考试范围,从而把自己的很多精力用在儒学之外的子学上。他早年的很多著作是对子书的注解,比如对《老子》、《墨子》、《说苑》、《六韬》、《孙子》、《吴子》的注^[11]等。《老子本义》最突出地表现了魏源以子学经世的思想,也即认为通过子学亦可救世的“子学致用”思想;而细观《老子本义》却可以发现,魏源“子学致用”思想的渊源其实亦是湖湘理学。

首先,魏源的“子学致用”思想来源于其固有的湖湘实学思维。魏源面对国家疲敝,社会动荡的“末世”局面,不得不有感而发,试图从传统经典著作中找寻“救世”之道,而湖南又属于老子思想发源地楚国的一部分,历代深受老庄思想的浸润,甚至已形成的湖南文化中都存有老庄的因素,所以魏源能在一贯地排斥老学的传统学术氛围中提出深入挖掘老子思想的社会价值的想法,把老子的思想解释成为与儒家学术异曲同工、相辅相成的“救世”哲学。其次,魏源在《老子本义》中经常以道家思想比附儒家,其手法极似宋明理学之“援佛入儒”,比如:“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宝,一慈、二俭、三不敢为天下先。慈非仁乎?俭非义乎?不敢先非礼乎?《易》曰:‘德言盛,礼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老子有焉。”^[12]将《老子》的“三宝”“慈、俭、不为先”分别与儒家的仁、义、礼相对应而言,这种从概念上生搬硬套的做法,明显是援道入儒之举。再次,《老子本义》中充斥着大量对“道”、“器”、“理”、“性”、“心”、“欲”等理学概念的论述,比如魏源对《老子》三十二章的解释便有此等按语:“盖欲作者,欲生萌动也……亦镇之以无名之朴而已。无名之朴者,以静镇动,以质止文,以淳化巧,使其欲心虽将作焉而不得,将释然自反而无欲矣。无欲则静,静则正,而返于无名之朴矣……诸家或无‘夫’字,或作‘不欲’,故其说谓圣人并此无名之朴,亦不欲存之于心。夫苟为圣人所不欲,尚何谓‘无名之朴’乎?”^[13]在这里,魏源指出圣人并非“不欲”,但是圣人可以通过“夫亦将知止”,即在内心自反、“镇之以无名之朴”,从而达到“无欲”。很显然,魏源这种解释与张栻的“察识端倪”之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他用理学的性心之学来解释道家经典,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理学

根基的功用所致。在此基础上,魏源“由对于个人心性的理解,推广到气运时势的变化”^[14],把宋明理学的“性”等范畴与《老子》之“道”相结合,阐明《老子》所谓“无为而治”并非单纯消极而言,而是与儒家的修齐治平的人世观念异曲而同工的,从而将《老子》与《庄子》、释氏区别开来,在子学领域开创了经世致用之风,影响了晚清学术风气的转变。而在后来的学术道路上,魏源开始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试图更广泛地将济时救世的实学理念贯彻到其学术研究中去。

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参加了嘉庆十八年的拔贡考试并脱颖而出被选为拔贡生,次年便启程前往北京求学应考。在北京期间,他拜访了其座师汤金钊、时任京官的湖南人陶澍和周系英,以及曾经为湖南学政的李宗瀚,通过他们,魏源得以“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塈,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古文辞则与董小槎太史桂敷、龚定庵礼部自珍诸公切磋焉”^[15],使自己得到诸如汉学、宋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等各种学术圈领军人物的指导,从而使其学术视野大开,学问也大为精进广博。尤其是接受刘逢禄的今文经学的主张,使魏源的学术道路真正实现了他通经致用、济时救世的初衷。

刘逢禄作为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关键人物,他阐发了西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的微言大义,倡导以三科九旨为核心,从而使“春秋学”由东汉古文向西汉今文回复,用以说明社会变革的天然合理性;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的影响下,魏源开始主张经学研究要从乾嘉学派的训诂返回到东汉的典章制度,由典章制度再返回到西汉的微言大义,即所谓“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16]。在接受了今文经学的学术思想后,又在胡墨庄传授汉学家法的帮助下,魏源究心汉代齐、鲁、韩三家《诗》说,并试图通过发挥三家遗说以发挥三家微言大义,这成为魏源代表作《诗古微》的著述动机。这种思想体现到《书古微》的创作上便是“夫黜东晋梅賾之伪以返于马、郑古文本,此齐一变至鲁也;知并辨马、郑古文说之臆造而无师授以返于伏生、欧阳、夏侯及马迁、孔安国问故之学,此鲁一变至道也”^[17]。魏源的这种由齐至鲁至道的“复古”,明显地是对当时经学领域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不满:乾嘉汉学只讲训诂,不讲大义;宋学又泛言义理,空疏成风。魏源认为只有西汉的“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学术才是真正有助于挽时救世的实学,而西汉学术的主要特征便是今文经学,这也是魏源选择投身常州学派的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魏源虽然不满于当时的汉宋之争,且对汉学与宋学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仔细对比便发现魏源对宋学的批判是有限的,实则是基本认同宋学的。比如对于他的《诗古微》,皮锡瑞称“魏源之驳《毛序》有朱子已言者”^[18],虽为批评魏源之语,但从反面说明魏源并非完全舍弃程朱的经学成果。另,《诗古微》下编之《诗外传演》下篇皆取王夫之《诗广传》之文,用王夫之的人性化的实学理论来作为《诗古微》经世致用的注脚,可见魏源对湖湘实学的继承与发扬。《古微堂外集》卷二收录有魏源分别对孔子、孟子、曾子、颜渊、冉雍、周敦

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杨慈湖、王阳明、高攀龙、刘宗周等 14 人进行赞颂的 12 篇“圣贤赞”^[19]，从中可看出魏源对宋明理学承继孔孟道统的认同，亦可见魏源心目中的“道学体系”，既有程朱一派，又兼陆王一派，还有调和程朱、陆王的学者，由此亦可见魏源力主于儒学内部尤其是宋明理学内部消弭门户之见的主张。此外，钱穆也认为魏源的《古微堂集》中：“《大学古本》、《孝经集传》及《曾子章句》诸书，皆带宋学气息。”^[20]

魏源的这种对反对汉宋门户之争、对宋学既批评又偏向支持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源于他的实事求是，不因站队问题而诋毁异见，另一方面则源于他的理学根基和救世之志，正因为他深受湘学实学传统影响，一生执固于追寻济时救世之道，虽然宋学在当时也呈现出空谈性理的弊端，但总体而言，当时能够在道德上对净化官场、教化世人有所帮助的也就是宋明理学，所以魏源宁可选择支持宋明理学、支持理学派，这也是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的最符合其致用实学思想的选择了。无论是在对子学致用的努力上，还是在当时的汉宋之争中保持反对门户之见、实则偏向宋学的态度，还是在学习汉儒师法家法、最终走上今文经学之路，都可以从中见到魏源的学术兴趣更多的是在乎学术能否产生济时救世的实际功用，而他的理学背景和实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一脉相承的贯穿作用。

三、坚持历史进化论为改革的指向

嘉道年间，以陶澍、唐鉴、贺长龄、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湖南籍高级官员，利用其在政界、军界的影响力，在湖南理学传统实学思想的指引下，推行他们广泛的变革政策，并将他们的经世主张推荐给清政府，其影响渐及于全国，从而形成了实力强大的湖湘理学经世派。而魏源由于长期科举未第，不得不进入贺长龄、陶澍幕府赞襄军民政务，将其致用实学思想应用于筹划幕府事务，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客观上也为湖湘经世派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对理学经世派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加入陶澍、贺长龄等人幕府，帮助他们书写文书和帮办政务外，还为其推行经世改革措施提供全方位支持，成为改革措施的谋划者和执行者，为理学经世派的发展壮大不遗余力贡献一切。

魏源初入贺长龄幕府便帮助其纂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使得经世致用的学问在士人心中落地生根，不仅扩大了理学经世派的影响，而且也为后来的维新、变法提供了治理理念的素材。与此同时，魏源还写下了《筹漕篇》、《筹鹾篇》、《筹河篇》等一批经世之作，提出了自己对当时的漕运、盐政、河工等“三大难政”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大部分转化为理学经世派实际的治理措施，取得了不错的实际效果。漕运、水利、盐政三大难政，一直影响和困扰着地方督抚，积重难返。魏源在贺长龄和陶澍的幕府中，却能够运筹帷幄，良策继出，有效地缓解以及消除了这三大弊政，不能不说魏源是干吏、能吏，他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措施，凭借其幕主的地位得以实施，这就使得魏源的才能没有白费，转化为“理学经世

派”的整体功劳,在近代中国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著书立说,为改革提供思想支持。魏源首先坚持历史进化论主张,在此基础上展开他的改革阐述。他认为“三代之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21],而且社会是一直前进的,制度也要跟随社会前进才能适应形势需要,“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丘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彍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22],这就为改革措施的提出清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障碍。

在改革的目标上,魏源坚持“王道”“富强”观念,对儒家的义利之辨做出了新的阐述:“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卫之;禹平水土,即制贡赋而奋武卫;《洪范》八政,始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攘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23]魏源对改革的目标“富强”与“王道”进行了辨析,认为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并且引经据典,从《周易》《尚书》中找出“圣人之制作”里有关“利”的言论,来为自己的富强王道观作证。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社会意识里是属于偏激另类、不合时宜的,因为儒家讲究先义后利,或者存天理灭人欲。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段文字,可以发现魏源思想的超前性,没有富强、没有利益、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怎么能实现王道?魏源的这种思想跟后来他提出的与外国进行商战以谋求国家利益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在改革的措施和改革的态度上,魏源提出的措施之多不胜枚举,如前述其在幕府所作诸书对“三大难政”的意见,又如其代表作《海国图志》中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阐发,尤其是“师夷”主张的提出,使得魏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通经致用”的范畴,因为他主张的“经”竟然多出了与儒家不相干的“夷学”,这是当时的理学家们所不可思议的,也是为理学理论所不允许的;但是在改革的态度上,魏源又认为必须坚持理学思想的导向,他说“执此书(《海国图志》)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24],这说明他认为“师夷”只是手段,手段之外还有一个根本,即所谓“人心之积患”,而要平此积患、维护根本,便要去除空谈风气,注重人格道德修养,以此来维护道统和治统。

魏源的改革思想在当时是超前的,而他提出这些改革措施的基础便是他的历史进化论。魏源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感觉到历史趋势不可逆转,所以能够发出向先进学习的口号,并抛弃君子固穷的儒家旧说教,倡导进行一系列的不触

及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从来源上讲,魏源改革思想正是源于其务实求用的实学理念,源于其思想的本根——湖湘理学,而正是这个“理学”,导致魏源不能也不敢前进到主张社会制度变革的层面上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思想的局限性。但是应该看到,他在当时对理学经世派的贡献,对改革运动的各种主张,已经在社会诸多领域造成了积极的影响,更应该看到的是,魏源作为湖湘学者的一员,继承和发扬了湖湘风气,对理学的复兴与晚清学术思潮的趋向实学化都有着独特的贡献。

综上所述,魏源一生的思想变迁,从笃信官学,有志于科举,到博采众家,趋于全才,再到投身今文经学,大倡经世致用、改革救世,都有他本身深厚的理学根基和他秉持的实学风气这些因素的存在,可以说,魏源的思想渊源就是湖湘理学——这个传统儒家地域学术分支,不止直接导致了湖南自宋以来的传统文化的诞生及发展壮大,也造就了像张栻、王夫之、曾国藩这样带有典型的湖南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特征的历史人物,而魏源就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位。虽然魏源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他特别的个性,但是总归而言,他的根本归属还是湖湘理学传统学者这个群体。明确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魏源思想变迁的脉络,而且有助于正确看待近现代史上的学术思潮,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湖湘文化的地域特征。

注释:

[1]姚永朴:《魏默深先生传》,见《碑传集补》卷24,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2年;引自《魏源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650页。

[2][11][15]《魏源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618、640、619页。

[3]“问:‘先生答湖湘学者书,以爱字言仁,如何?’”见黎靖德:《朱子语类》卷6,《性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页。

[4]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34,《武夷学案序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0页。

[5]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12,《五峰学案》全祖望案语,中华书局,1986年,第1366页。

[6]朱汉民、陈谷嘉:《湖湘学派源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36-340页。

[7]葛荣晋:《论中国实学》,《宁波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

[8]朱汉民:《论湖湘实学传统的近代转型》,《船山学刊》2006年第3期。

[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8,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页。

[10]李瑚:《魏源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第11-12页。

[12][13]《魏源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647、689-690页。

[14]贺广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传统经典的论说为讨论中心》,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年,第81页。

[16][17][19][21][22][23][24]《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137、111-112、187-191、48、49、36、201页。

[18]皮锡瑞:《论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见,魏源多本其说》,《经学通论》(二),中华书局,1954年,第29页。

[20]钱穆:《读〈古微堂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1页。

[责任编辑:嘉 耀]